



易詮釋中的 儒道互動

鄭吉雄、林永勝 主編

易詮釋中的 儒道互動

鄭吉雄、林永勝 主編



B221.5
20144

易詮釋中的儒道互動 / 鄭吉雄, 林永勝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臺大發行, 2012.06
面; 公分. -- (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 6)

ISBN 978-986-03-2583-6 (平裝)

1. 易經 2. 儒學 3. 詮釋學 4. 研究考訂 5. 文集

121.17C7

101008698

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 6

易詮釋中的儒道互動

主 編 鄭吉雄 林永勝

叢書主編 鄭吉雄 伍安祖
總 監 項 潔
責任編輯 紀淑玲
文字編輯 傅凱瑄
助理編輯 陳俊榮 張凱喻
封面設計 楊啟巽
內文美編 鄭富榮

發行人 李嗣涔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
印 製 上承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12年6月初版
定 價 新臺幣420元整

展售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10617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北市10087思源街18號澄思樓1樓

E-mail: ntuprs@ntu.edu.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臺北市10485松江路209號一樓
國家網路書店

電話: (02) 2365-9286

傳真: (02) 2363-6905

電話: (02) 3366-3993 轉 18

傳真: (02) 3366-9986

<http://www.press.ntu.edu.tw>

電話: (02) 2518-0207

<http://www.govbooks.com.tw>

GPN: 1010100980

ISBN: 978-986-03-2583-6

著作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序：《易經》文本的經典性和宗教的 終極性

伍安祖*

* 現任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歷史、亞洲研究及宗教哲學教授兼亞洲研究學程主任。

《易經》已成為世界經典之一，這是不再需要反覆驗證的事實。曾醉心於其哲理的西方知識菁英不知凡幾，舉其犖犖大者，如早期的現代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到精神分析學者榮格（Carl Gustav Jung），以至於科幻小說作者狄克（Philip Kindred Dick）等。但《易經》對許多人，包括中國經典文學翻譯的大師理雅各（James Legge）來說，「翻譯和理解」都是步步艱難的。倘依弗雷（Northrop Frye）借用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說法，聖經是西方文學的偉大符碼（Great Code），那麼對《易經》也應作如是觀。《易經》形塑了中國的宇宙論，醞釀了深沉的哲理，透過經卦、別卦陰陽組合而成的圖像架構，《易經》在動態的混沌中建立了本體宇宙論。陰陽互相鼓盪，支撐起「變」的核心理念，鋪陳出蘊涵無窮智慧與意義的宇宙，為人類基本價值與信仰建立了可供理解的基礎。世所習知，《易經》獨特精巧的宇宙觀與深沉的道德倫理，歷經中國思想史的各個年代，而被儒、道的信徒視為最根本的經典，是啟導人們觀照宇宙運行的智慧泉源。然而，《易經》出現伊始，即已是一部成於多位聖賢之手的成熟作品，相傳由伏羲、文王、周公等撰寫，並由孔子集大成。歷代讀者大多懷抱著神聖的信仰，視此一撰著譜系為史實。這種對於「已知」作者及著作權毫不懷疑卻又無從查證的困難，反而拓展了詮釋的可能性，引發一連串相關的問題：經典的本義為何？聖賢撰著的目的為何？作為讀者，我們應如何理解其內容呢？換言之，經典的真實內容需要被重新建構，這就讓詮釋學有了參與的正當性。《易經》以及其他中國經典豐富卻又歧異的注釋傳統，其實都是在詮釋學的土壤上開花結果，將神聖的微言大義逐一昭顯出來。

多元與分歧的詮釋，對於《易經》集大成的真理信念是絲毫無損的。就中國注經的學者而言，經典蘊涵著相連貫及可回溯的哲

理潛德之幽光，藉由無數注經者之心與手一一抉發。開宗明義，詮釋的首要之務，即在於確立經典的文化力量與象徵意義，終則又始地確認《易經》的經典性與典範性——這也是中國注經者的中心信仰。在此中，詮釋學上的顛覆案例當然是存在的，但它始終是藉由注經者不斷檢視、反思、修正前儒的注解、論說，以求彰顯上古聖賢的理想、觀念而進行。經典神聖地位成為後世讀者的主觀想像與歷史文化的客觀事實兩方面的共同支柱後，閱讀與再閱讀的連續工作，就如同百川並進、共同朝向經典本義的大海灌注新義，遂成就了《易經》豐富而多樣性的詮釋傳統。

這當然不表示在任何時候閱讀《易經》，書中亙古的經典智慧，即可跳過時空，自動展示出其具無上權威與感染力的真理，彷彿經典本身就是創造與啟發的寶庫。縱使傳統解經者如朱熹等深信閱讀經典就是直觀詮解聖人之心，但此際我們也都明瞭舒拉瑪赫式（Schleiermacherian）「與作者的想法融為一體」的境界，恐怕只是存乎空想。另方面，我們也無法相信像後現代和解構主義原理所提示的，讀者可以跳脫經典，縱橫自如地自抒己見。總有一刻，讀者從一個特殊時空進行解讀，「理解」這件事就必然是「視域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亦即作者的經典，文本和讀者的理解脈絡相疊合。講得仔細些，這個過程涉及了作者、文本、讀者以及預設詮釋，需要注入想像力、同理心、語言技巧、歷史知識和其他的專業知識。

透過上述由當代理論開示的詮釋可能的觀照，我們即能思考《易經》文本與注解所抽繹出來的終極真理之間的關係，用詮釋學術語講，就是「道」、「陰陽」、「天」、「理」。真理，隱伏在經典文獻的內容裡，儒家的哲學意涵則陶鎔在文獻之中。事實上，《易經》和其他的儒典，都是古代聖哲思考人我關係的基礎，不是

因為他們將經典視為絕對性的教條和權威而盲從，而是因為他們都體證了上古聖賢所經歷過的特殊社會人生與價值。不過後代學者融入經典之中，二者之間必然有某種調和的橋梁聯繫了時空的隔閡，最重要的橋梁就是傳注（其中已包含了閱讀、詮釋和理解）。最後，這種與經典的相遇，必然逼出一個先聖先哲早已揭示的，追求在無垠時空中之超越性真理為目標的需求。吾人可視此種追求在本質上與目的上具有宗教本質。

討論到經典詮釋，首先要反思關於「閱讀」和「理解」的當代主流理論。當代主流理論認為，大多數論述的範疇與困境都是被自身語義所劃定的。經典賴以構成的「語言」，似乎並不足以創造、傳遞和界定穩定的意義，對於繁複而多層次的意義，提供的參考也相當有限。不論是有意的誤導抑或無意的差謬，語言文字其實難以成為知識傳承的工具。因為「語言」是一個封閉系統，言說者永遠能自圓其說。用語言來描述客觀實存的外在世界，其實是難乎其難。同樣地，運用語言文字撰寫經典文本的作者，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去支配自身語言的任何理解。換言之，撰著者的本義其實是弄不清楚的，只有讀者才能以其特殊歷史文化背景和立場，去創造與決定經典文本的意義。這種閱讀的原則規範了閱讀本身必然是多樣性，文本也是眾音交響的。順而推之，傅柯（Michel Foucault）大膽指出「人的死亡」，點出了寫作的主題無可避免地被消融在游移流動的語言之流之中。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指出，運用文字的思考 and 寫作必然造成「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因為所謂「作者」不外乎是一個理想化的文學表現和形塑，既沒有主體的獨立性，就只能受語言支配，而成為一個「發言者」甚或僅僅是一個假象而已。總而言之，基於文本的文學性，作者的本意及形成本意的歷史背景，都是不能確定的。經典意義及其

神聖內涵完全開放予讀者的多元理解，我們也就無從自經典中抽繹出真實典範與基準意涵。

上述這種對於文本與閱讀抱持極端的、懷疑的詮釋觀點，在當代即使不能說已成教條，但至少可說是一種學者喜循的常軌。這種捨棄古典的追求文本「本義」和作者「本意」的、打破舊瓶又重釀新酒的詮釋方法，果真讓我們對所傳承的文化和歷史的資產，有更嚴肅和豐富的了解嗎？這樣極端的立場難道不會既導致蔑棄傳統文化，同時也輕視一切人類的文化活動和價值嗎？從有益於提倡倫理和道德深思的動機看來，以激進的方法將讀者的時代感不斷摧毀然後重構，難道就能獲得理則和救贖的力量嗎？將極端質疑傳統價值的詮釋論說，以及其混亂價值體系的外衣一一解剝之後，不就只剩下後現代混沌一片的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響嗎？

其實，在「追尋經典本義」與「強調開放多元」之間，還有另一個詮釋的空間，既容許讀者對原文內容多樣解釋意義的包容空間，也尊崇經典文本的實存和語言的權威。這種以「對話」為主的詮釋理論型範，首先被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揭示並發展為深微的詮釋與理解哲學。伽達默爾深信，「『本義』可以被讀者徹底逆知」這樣的浪漫觀點毫不足信，認為「理解」時刻受到讀者特殊的文化立場與歷史情境所宰制，「詮釋」也是不斷回應主流詮釋論點而產生的洞察力，「文本」不需權威理論的認可亦足以引起多重解讀。然而，伽達默爾的鉅著《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的關懷主軸，是在於經典承載真理的功能和特性（均屬於文字形式與藝術範疇）。正因為經典昭示了存在的真理，他抨擊極端詮釋理論以特殊的歷史脈絡狹義化了經典的定位與源頭，精巧地弱化了經典宣示永恆真理的能力。

在任何情況下，詮釋者的前理解既然無法排除，閱讀中的歷史客觀性必然是虛幻的。事實上，詮釋者預設的理解、想法和偏見構成了他的視界，也可以說是「有效的歷史自覺」，不但不須迴避，更應徹底弄清楚。「讀者」和「文本」兩個視界的接觸，就像對話一般，因為二者的關係本來就不是陌生人，而是共同分享著一個持續不斷的傳統，都是活生生的歷史參與者，讀者對經典的敬意，更加強了「傳統」對於讀者本人千絲萬縷的牽纏。對伽達默爾來說，經典就是傳統的化身。它既產生自特殊的歷史情境，又如何能全盤理解呢？再說，經典的價值與影響是歷經千百載的積累而奠立的，其蘊涵的真理與其恆久性相為表裡，不但渡越時空、聯繫古今，同時也透過傳統消融在歷史文化的熔爐，進而投射到未來。因此，千百年來讀者時常依緣其歷史情境而解讀古代經典作者的意志，進而重釋經典的意義。作者與讀者之間，充滿了層層疊疊的風俗與傳統；「鴻溝」一詞，已不足以描述經典撰著的發生和讀者詮釋之間的距離了。在伽達默爾而言，讀者要避免陷入時空錯置或盲從信仰的困境，就必須依照當下的文化脈絡去閱讀和理解經典，同時正視此一艱鉅工作的辛苦與困難。進一步說，要追求真理，流連於當下也是不夠的，還要時刻求索、啟導前景於未來。歷史早就證明，文化的綿延，久已仰賴歷久彌新的經典來證明人性的光輝並促進生命的意義。

倘若借用成中英在伽達默爾及西方的詮釋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本體詮釋學」（onto-hermeneutics）的理論考察，《易經》卦爻體系呈現的是宇宙萬物的網絡關係，也申明了宇宙規律的共時性與創造性。在這種天人和諧觀中，「自然規律」並非獨立於文化以外的「他物」，而「道」或「天」也不可被理想化為一超越性的永恆實存（Being）。由此而論，讀者與《易經》文本之間，也不是單

純的「閱讀」和「被閱讀」的關係，而是由讀者作為一個仁者，藉由道德實踐的力量，在生活中呈現《易經》文本所開示的理念。基於上述所講的宇宙萬物的網絡關係，讀者與他人其實也像《易經》卦爻的整體性關係，既不是存在於文本之外，相互間也無法切割。每個個體都必須從他人身上確定自我——也惟有透過他人的映照，才能確認自我的存在。這種綜合觀察原理即來自《易經》。《易經》提示了我們：宇宙與人文是相交織的，經典是動態地時時刻刻與社會文化共生共存的，自我的了解並不是發生在自我本身，而是透過自我、他人、宇宙的認知和相互的了解，進而從人際關係中發現自我。藉由《易經》的啟示，極端懷疑的詮釋觀點或深信經典具有本義的觀點，都可以在這種觀照中發生新的聯繫。我們利用《易經》的學說體系作為座標，不同的詮釋進路所產生的矛盾，便自然而然透露出被消解的可能性。

《易經》宣示的宇宙真理，以及這些真理對人類世界的投射作用是無庸置疑的。它作為一個原創的文本，是神話傳說、文化原始與歷史敘事的泉源，也為中國文化社會穩定及認同，提供了動力。《易經》所載的神話就是弗雷所謂的「偉大符碼」，也就是伏羲氏仰觀俯察，「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恰如「古史」與「象徵」互相交織的大網絡，文化圈中無量數的成員就在箇中不斷實踐生活、探索自我。世俗與神聖，在《易經》中是合為一體、形神相依的，一旦其神聖的神話地位被摧毀，實質文辭也將一無所有，於是人類社群寄託其中的意義與情感也將失去依傍。在此一意義上，《易經》的詮釋學是深具宗教性的。

借用 Ronald Thiemann 的話，經典發揮了「背景信仰」（background belief）的效用，是一切思想、信念、價值、規範的託命之

地。經典之所以是「根源」（fundamental），是因其「自誠明」——集基礎信仰之大成並統合相關價值觀念；經典之所以是「背景」（background），則是因其「自明誠」——不證而自明的。也許「背景信仰」的枝葉會與時變化，但其大根大本則始終不變，其整體架構成為各個學派學說價值體系開展的源頭活水。在中國思想史上，閱讀與理解獲得空前的縱放，透過傳注的途徑，真理的追求在經典的詮釋中獲得了保證。換言之，中國哲學不是系統形態，而是注釋形態。這就要進一步明其究竟。「哲學」竟然可以由傳注展開，顯見中國哲學的基本形態，和西方哲學的「基源主義」（foundationalism）大異其趣。「基源主義」主要認為知識本是無中生有的，最初是源自若干無可置疑的、決定性的理則，而逐漸將其他知識一一奠基於此一基礎上。這是古典的笛卡爾式（Cartesian）對知識的理解。他們相信某些理則是至為清楚而且真實，可供所有知識建構於其上。笛卡爾式的理性主義深信，基礎理則是自明自足（self-evidence）地昭顯。此一觀念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早已堅信不疑——事理只要被透徹了解，就是如如地自明自足的。這種理性主義者對知識的宣示，是很具爭議性的，因為所謂自明自足，必然是主觀的——不同的思想家所深信為自明自足的事理會各不相同，這樣就變成人人言殊。個人的思維基礎所構成的中心概念，復又使個人更堅執於其業經內化的主體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的名言「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正是指人對揭示真理的能力不再受傳統與社群範疇的羈絡。個人既直接訴諸心體的昭明，於是根據自身精神驗證的主觀真實，將絲毫不差地證明自身的存在。

相對上，中國的思維世界與上述西方哲學「基源主義」大異其趣。它從未預設「無中生有」這樣的前提，而是深信無論如何必須

尊重早已存在的知識；而來自於經典的知識也終將反饋經典，成為經典背景信仰的一部分。職是之故，中國思想並非系統性的，而是藉由它自身的清澈朗現、自明自足的實理中，逐步繼承累積，始簡而終大。它是經由閱讀與詮釋形成傳注傳統，而將歷史文化的經驗吸納在其中。詮釋學「hermeneutics」一詞源自希臘語「hermeneuo」，語源出自眾神的信差「Hermes」，詞義為「解釋」或「翻譯」。它是詮釋的理論與實踐，尤其專指神聖文獻的閱讀。閱讀與理解的無盡旅程就是永無止境的「詮釋之環」（hermeneutic circle），那就是在回歸文本的工作中創造新意義。這樣的閱讀與理解的行為模式，無疑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無論是讀一本書、看一部電影、欣賞一件藝術品，它都無可避免地隨時發生，讓我們進行了解與推理，甚至有時候每次接觸同一件作品，都有不同的創獲。詮釋學既關乎解釋，也涉及意義和理解，在一個本體論的意義上，它雖已逐步離開了實理與真相（reality and truth），但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中，實理與真相也就完全存在於「理解」與「求義」之中。

鄭吉雄教授與林永勝教授六年來推動《易經》詮釋和儒道思想對話的研究計畫，我一直都有參加。他們合編這部論文集，論題集中在比較《易經》的儒家詮釋與道家詮釋，以及儒、道思想的對話與互動，涉及中國哲學的重大課題，尤其與探討閱讀、理解、意義等原理的詮釋學理論有關。我很榮幸受邀為這部書寫〈序〉，特別透過比較中西經典詮釋傳統的理論背景，提供讀者一個考察《易》詮釋與儒道互動的座標。盼東西方哲學詮釋學的專家，不吝賜正為幸。

目錄

序：《易經》文本的經典性和宗教的終極性	伍安祖	v
導言	鄭吉雄、林永勝	001
壹、從遭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 ——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	鄭吉雄	011
貳、《易傳》符號解釋視域下的儒道互補	林忠軍	053
參、儒家對《易》的經典化	淺野裕一	081
肆、由《論語》、《孟子》考察《易傳》 構成的儒學成素	曾春海	103
伍、《易傳》中「儒道互動」與儒家 「道德形上學」發展	黃明誠	127
陸、從王弼《周易注》看詮釋中的儒道互動	金春峰	171
柒、從儒道互動看清初《易》學的特色	汪學群	201
捌、先後天學說與儒道思想	張善文	217
玖、邵雍《易》學思想中的儒道融通	孫劍秋	231

拾、張載「太虛即氣」重釋 ——兼論兩種型態的非一非異之說	林永勝	243
拾壹、從「自然主體觀察」論《周易》經傳的書寫	黃忠天	271
拾貳、《周易·繫辭傳》「易」、「簡」思想析論	賴貴三	301
拾參、《荀子·正名》釋義：語意學的詮釋取徑 ——以莊子、荀子對言辯的反省為背景	伍振勳	345
拾肆、太極圖與無極圖的文獻與哲學詮釋：自然與人文的對話 ——易之五義的本體詮釋與象徵詮釋	賴賢宗	385
拾伍、從「禮玄對舉」到本體論理解：論唐、牟二先生對王弼《易》 學之詮解所呈顯的哲學史意義	許朝陽	413
人名列表		443

導言

鄭吉雄^{*}、林永勝^{**}

^{*}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歷代不同思想派別風雲際會，離合異同，是思想史前進動力的活水源頭，古今中外思想史的大事因緣。在中國，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衝突與交融，既引發了思想界有無之辨的論爭，也促使了政治界激進與保守的碰撞。先秦道家典籍如《老子》、《莊子》不乏反儒的言論，荀子則批評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漢景帝時黃生與轅固生關於革命合法性的爭論，人所共知。自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孔子問禮於老子，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互動，更成為中國思想史上最有趣的課題之一。秦漢以降，兩派學者或勢成水火，固守壁壘；或倡言均善，力主融通。在論辯的過程中，歷代學者不斷在整理、回顧之中找尋新方向，逐漸形成兩派各不相同的譜系與理念。我們今天回溯兩派思想的譜系傳承，發展和分化，必須用宏觀的視野，盱衡整個思想發展與轉變的關鍵，進而明瞭歷史洪流的流向，考察各時期思潮盛衰如生命般之成長、轉化、衰老與再生。我們尤應該從譜系與原典兩方面參互推研，窺探二派之衝突與對話的深層意義。我們認為，衝突與對話往往是並存的，因為從思想史的一般規律而論，任何思想發展到後來，或多或少都會遇到困境，並在發生弊端之餘，興起新的論述。明瞭二派的互動，尤其考察二派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在何種困境下進行迴護與批判，至為重要。因為批判對方、迴護自身的言論，也往往隱伏自身論述的調整與新詮，不自覺地汲取對方的優點，以奪回哲理的解釋權。所以，所謂「衝突」與「對話」，從某一個層次來講，也是一體的兩面：衝突在對話中默默發生，對話也在衝突中不斷展開。《周易》「乾」卦《彖傳》在提出陰雨（雲行雨施）與陽光（大明終始）的生生效用後，又提出「保合大和」，強調最大衝突中的最大調和（harmony in conflict）的理念。儒道思想的衝突與對話，也許正符合此一道理。

從學術淵源的角度考察，《周易》是探討儒道思想互動問題

中，最不可忽略的經典。「經」的部分暫且不論，即以「傳」而言，讀者習知，《易傳》作者每以「子曰」申述孔子學說，而其所暢述的陰陽理念又多道家思想的痕跡。藉由考察儒家《易》詮釋與道家《易》詮釋的異同，探討二派思想的同異合離，是值得一試的。基於此一理念，我們於二〇〇五年八月假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舉辦了第一屆「《易》詮釋中的儒道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會者咸覺收穫良多，促使我們在其後又推動了「《周易》經傳的形成發展與轉化」及「先秦儒道思想的互動與對話」研究計畫，¹持續針對儒家、道家文本與思想的傳承與互涉問題，作出多方向的探討。第二屆「《易》詮釋中的儒道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假高雄師範大學與該校經學研究所隆重合辦，二〇〇九年十月我們再假臺灣大學文學院舉辦第三屆「《易》詮釋中的儒道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三屆研討會宣讀了三十五篇論文，加上研究計畫的成果論文共計四十餘篇。本書選取了主題集中關於儒家《易》詮釋與道家《易》詮釋互動，以及儒道思想對話的論文共十五篇，輯為一冊，以饗學界。我們比較了各篇論文主旨後，歸納出五個主要的探討方向，訂定了篇次先後順序，謹略述其理路如下：

第一個探討方向，論證了《易》為儒道共通的經典，由此才會產生儒道互動的結果。鄭吉雄和林忠軍撰寫的兩篇論文分別從不同角度思考此一問題。鄭吉雄〈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指出周民族自古公亶父即計畫翦商，武王滅紂後進行轉型正義工程，提出有德者得天命的朝代遞嬗原則，確立革

¹ 兩個計畫分別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戰國學術整合型研究計畫」（2006-2007）及「先秦文本與思想研究計畫」（2008-2010）的子計畫。